

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的六个支撑点

□ 李少华



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必然选择。当前农村人居环境问题仍然存在、绿色有机农产品供给不足，已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要坚定不移贯彻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的要求，解决新问题、培育新动能、厚植新优势，推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实现产业强、生态美、农民富相统一，生产、生活、生态相协调，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中央和地方协同，健全绿色发展制度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要分清事权、明确责任，按照城乡一体化要求，加快建立适应绿色发展需要的宏观调控、资源配置、生态补偿、项目支持、金融扶持、考核评价、责任追究、联合执法等制度体系，健全生产、技术、质量标准体系，强化法律法规建设，调动政府、企业、农民、科研人员、社会力量绿色发展的积极性，使绿色发展成为普遍形态。要对现有农业法律法规、政策文件、技术标准进行梳理和清理，凡是不符合绿色发展要求的都要尽快调整或废止，确保绿色发展制度“长牙”、法规“带电”、约束有力。

融合和升级共促，做大做强农业绿色产业。产业兴旺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前提，产业振兴必须以绿色为底色、底线。坚持融合发展、创新发展，推动农业绿色产业与工业、新型服务业融合，与旅游、文化、健康产业融合，加快用绿色产业改造传统产业。加强农村景观修复和生态化改造，提升“蛙鸣鸟叫”“养眼、洗肺”生态功能，实现山水林田湖草路统筹发展。建设绿色产业大数据和物联网平台，开展资源利用、面源污染、环境监测预警，对不符合绿色发展要求的产值、产业和资源消耗要坚决问责和追责。建设新型物流、发展农村电商，使绿色产业成为新型主体和广大农户增产增效、发家致富的增长点，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强大动能。

政府和农民共治，大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一是创新共治机制。一方面政府要加强农村饮水、污水管网、垃圾分类存放、生态景观、村内道路、废弃物集中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要加大农民自主和合作

建设项目的资金支持比重，对由农户自己负责的庭院内部、房前屋后环境整治适当给与补助；对由村民自治或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的村内环境、村内道路、植树造林等小型公益项目列出支持清单，鼓励村级组织自主选择建设，充分激发农民通过辛勤和智慧劳动建设家园的参与感、获得感，体现特色化，避免同质化，减少政府大包揽，切实构建乡村振兴中政府与农民共建、共管、共治的长效机制。这既是人居环境整治领域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需要建立的重大机制。二是抓好突出问题治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厕所问题直接关系农民群众生活品质，要把它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具体工作来推进，不断抓出成效。根据中央要求，当前要突出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以垃圾污水治理、厕所革命和村容村貌提升为主攻方向，构建长效管护和运营机制，加快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的突出短板，让农民生活质量的“里子”和农村环境的“面子”都好起来。三是防治工业污染“上山下乡”。目前全国600多个大城市中约有1/4的城市被迫将解决垃圾危机的途径延伸到乡村。要坚持内源外源共治，对农村地区的污染严格监测，对偷排乱排企业坚决查处、取缔关停，防止农村成为众所周知的垃圾转移“第三世界”。

存量 and 增量并举，大幅增加绿色发展资金投入。按照调整存量、争取增量、改革扩量的思路，构建财政有限保障、金融重点支持、社会积极投入的绿色发展多元投入格局。在调整存量方面，调整“三农”资金支持重点，推动农业补贴、生态补偿、科技

研发、项目投资、金融贷款等主要投向特色种养、质量提升、循环利用、污染治理、智力培训等方面，建立财政资金分配与农业绿色发展绩效挂钩的机制。在争取增量方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解决土地出让收益长期以来“取之于农、用之于城”问题的重要指示，调高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业农村的比例，做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基础设施建设、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公共服务、农业污染治理投资蛋糕。以2015—2018年4年间全国土地出让收益年均455万亿计，调高10个点，每年可为“三农”增加4000多亿资金投入。在改革扩量方面，加快释放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红利，建立农村“三权”抵押物评估体系，探索农村“三权”抵押贷款实现形式；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依法盘活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空闲农房、零散用地及宅基地等，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通过对工商企业实行税收减免、贷款优惠等支持，吸引工商资金投入绿色产业。

生产和监管并重，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一是狠抓产出来和管出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有关要求，加强源头治理、全程监管。建立生产者农资采购和施用台账，对规模生产主体和标准化生产基地实施全程、可视管理，推动国内外农产品同标、同质，建设全国性、区域性和田头三级产地市场体系，加快现代冷链仓储物流设施建设，引入互联网和电商销售机制，根据耕地质量等级优化生产布局，打造成本低、产品安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强的绿色农产品优势区域，到2022年，初步实现“四高一强”目标。二是强化中央督查威慑。

建立规模主体、生产基地和农资生产经营企业信用档案，每年按照一定比例抽查，开展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对生产假劣农资和施用禁用农兽药违法失信行为进行重惩，营造不敢违法不愿失信不想超施的氛围。三是开展第三方评价。第三方机构定期开展暗访检查，鼓励投诉举报，设立微信公众号等平台，畅通投诉举报渠道。

创新和推广同步，加快绿色发展技术供给。必须依靠科技进步破解传统模式粗放增长长期积淀的问题，用问题倒逼创新，在高起点上发力：一是加快科技创新。加强绿色发展战略性、基础性研究，增强科技能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加大绿色发展共性技术和关键设备研发，促进研究开发、成果转化、试点示范和技术推广一体化。改善创新环境，改进评价导向，营造敢于创新、便于创新、乐于创新的氛围，切实增强绿色发展科技支撑。二是提升主体智力。针对多年来各级行政管理干部、科技服务人员、生产经营新型主体等习惯于数量增长、高成本增长的实际，实施绿色发展富脑工程，加强绿色发展理念、产业政策、技术模式、绿色消费等培训。三是加快绿色发展技术推广。启动实施国家绿色技术推广工程，发布绿色技术名录，加快配套成熟技术应用，淘汰更新老旧技术，并对各类示范主体给与一定补贴，加快构建各具特色的绿色发展产业和区域格局。



大湾区也要建成生态湾区

□ 杨海波 李 元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家战略，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粤港澳大湾区（以下简称大湾区）既要建成科技湾区，也要建成生态湾区，珠三角九城全部是国家森林城市，也是我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城市群”。因此，粤港澳大湾区要形成山、海、湖、林、园五重生态湾区，必须在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上为其他地区提供更多可复制性的经验与做法。

建设大湾区生态防护屏障。大湾区要实行最严格的自然生态空间保护，绝不能碰生态保护红线。为了建立全方位立体的生态防护屏障，要从大湾区内外、湾区海域等区域构筑三道防线。

一是突出重点生态保护区，构筑各类生物的理想家园，根据资源禀赋和承载能力适当开展生态农业、生态林业、生态旅游等生态产业。加大投入进行生态系统修复工程，增强系统的环境容量与恢复能力。以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为抓手构筑湾区生态廊道，进一步提升大湾区生态系统的质量和稳定性，维护生命共同体。

二是加大对大湾区周边丘陵、山地及森林生态系统的保护，尤其是打造北部连片森林生态屏障。在大湾区生态保护上要坚持生态整体观，大湾区内11座城市和湾区之外众地区通过河流、连绵山体及动植物迁徙等形成彼此关联的整体。广东省为进一步加强全省生态保护形成工作合力，成立了生态保护补偿工作部门间联席会议。鉴于大湾区内外经济发展的差异

及跨行政区的生态系统，要加大生态补偿横向转移支付，扩大生态补偿范围，完善生态补偿机制。

三是加强大湾区海域保护。全世界50%的人口居住在离海线60公里以内的区域，湾区内有近7000万人口。海洋污染有危害深远、控制复杂、治理难度大及扩散范围广等特点，同时还直接影响人类健康。在大湾区内，要健全海岸线动态监测机制，强化海域使用事中事后监测，助推海洋生态保护。海洋自然保护区要确保海洋生物多样性，建设沿海生态带防止海洋受到污染，联合巡防、科考、监测以保护跨境滨海湿地，严禁“推诿扯皮”“以邻为壑”等情况发生。

加大环境保护治理力度。环境保护事关当前形势与未来发展，事关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家园安全，必须要全力以赴解决人民群众最迫切、最关心、最直接的环境保护问题，最大程度满足人民对生活环境的要求。

一是强化水资源保护。加强对东江、西江及珠三角河网区实施污染物总量排放控制，重点规范入海（河）排污，形成长效机制加强对跨区域的水资源、水环境以及相关涉水项目的合作。对产业要进行严格筛选，在源头上进行监管，对严重污染水质的企业要“关转并停”，尽一切力量保障大湾区水质达标。

二是加强土壤保护。土壤是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载体，一旦破坏或者污染超过“土壤自净能力”，恢复起来极为困难。对大湾区内受污染土壤要利用最先进的技术进行治理与修复，不能贪求“短平快”，要保持土壤治理

与修复的战略定力。采用先进农田灌溉、提升土壤肥力、改善土壤水分分布等技术对土壤进行改良，以弥补大湾区土地不够的短板。另外，由于大湾区的城市化率很高，建设城市公园、城市湿地和海绵城区是加强城市土壤保护的良好途径。

三是完善环保制度。环保制度是环境保护与治理的硬保障，制定制度要科学，执行制度要严格，变更制度要慎重，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不断完善环保制度。首先，要建立环境污染“黑名单”制度，坚持“零容忍”态度。其次，要健全环保信用评价制度与信息强制性披露制度，建立实时在线监控系统，第一时间通报环保信息，让人民群众成为知情人。最后，要执行“严惩重罚”的惩戒制度，不仅要对企业追责，更要对相关人士追责。

创新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创新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小而言之，关系到每个人的生活和相关企业的生产；大而言之，关系到我国相关行业在全球的竞争力及可持续发展。因此，实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是为大湾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要保障。

一是培养低碳生活观。生活观是人民价值观和实践观的具体体现，指一个人对待生活的态度与观点，培养人民群众的低碳生活观，不仅要从生活细节抓起，更要从“娃娃抓起”。加大节约资源与循环利用等宣传力度，积极响应国家节水行动，以低碳生活观深入人心，以低碳绿色、文明健康等理念引领人民群众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转变，大力建设城市绿道、森林

湿地步道，鼓励人民群众低碳出行。

二是树立绿色生产观。绿色生产，顾名思义即以减污、节能、降耗为目标，利用先进的管理与生产技术，在生产过程中将污染控制到最低，现代企业要树立绿色生产观，才能满足时代要求及提升核心竞争力。对传统行业进行低碳环保技术的升级与改造，“没有落后的产业，只有落后的技术”，相关部门应予以适当支持。对于国内处于领先的行业，采取清洁生产推动智能化绿色发展思路，推动行业进一步高端化。同时，要培育新的绿色行业增长极引领全球绿色产业发展的风尚，还要培育新兴绿色产业服务业态，加大绿色产业与物联网、物联网与大数据的融合发展，并实现生产系统和生活系统高效链接。

三是健全绿色低碳评价机制。没有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容易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困境，要寻找各方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才能制定和推动绿色低碳评价机制。在大湾区全域推广碳普惠试点经验，建立粤港澳三地的碳标签互认机制，为我国其他地区提供绿色低碳评价机制的借鉴。评价机制旨在提升生态环境，改善生活、生产方式，“使大湾区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



当前，在我国尤其是西部地区，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既是生态保护重点地区，同时又是欠发达地区，还往往是少数民族集中聚居区，生态保护与区域可持续发展、民生改善的矛盾比较突出。为了更好地推动生态产品的价值转化，需要从生态资源挖掘生态产品，构建生态产品的价值转化机制，打通生态保护、生态产业转型和生态富民三大通道，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绿色发展、民生问题改善的共赢局面。

立足于生态产品，探索生态经济合理的市场运营模式。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的生态产品不仅具有原生态、纯天然的特质，而且其生态资源和产品具有显著的稀缺性和有限性。基于此，其生态产品在价值实现的过程中，要在政府主导的原则下，推动当地居民、企业和社会各界人士的积极参与；要在保护稀缺性资源的前提下，注重传统生态生产方式与稀缺产品定价相结合的市场化运营模式；要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前提下，坚持以产定销的原则，努力实现资源保护和绿色经济协调发展的双赢局面。

在保护的前提下，推进生态经济化和经济生态化协调发展。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的首要功能是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要在这个大前提下对生态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开发利用和保护，需要注意生态经济化和经济生态化的有机协调。一方面，致力于生态资源的经济价值转化。可以通过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安排、流转和有偿使用，实施自然资源保值增值的激励政策，开展特许经营等，鼓励支持当地居民、社区、社会组织、企业投身从事生态保护事业，并从中获得相应的收益和补偿，从而把生态优势、生态财富有效地转变为经济优势和社会财富。另一方面，遵循绿色发展、资源循环和低碳环保的原则，在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所在区域中，推动发展有利于生态保护的生态农业、生态旅游和民族特色文化产业等，积极构建与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目标定位相适应的生态友好型产业体系。

坚持统筹规划，实施分区分类的差异化治理。由于地域差异，不同的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具有各自不同的资源禀赋、环境承载力、目标定位和环境保护标准，对此，要在充分考察、识别地域条件差异的基础上，列出适合不同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类型的生态友好型产业清单，对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园区内外产业进行统一规划、总体布局。在国家公园内部，不仅要加强对功能区实行差异化保护、修复和治理措施，而且要根据功能分区的保护策略，精准定位符合其发展条件的生态产业。比如，在核心保育区，只允许适度的科研和环境教育；在传统保护区、一般控制区可以布局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等对生态影响和干扰较小的产业；对于特色文化产业、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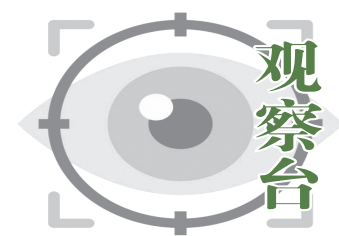
国家公园应推动生态产品价值转化

□ 杨汝坤

畜产品加工业和商贸服务、农家乐、牧家乐等产业，更多布局在保护区外的扩散区和服务区。

坚持以人为本，生态惠民、产业富民。落实好生态管护岗位、生态补偿等政策措施，完善和保障群众稳定收益的长效机制。发展生态友好型产业要更多地与群众转岗就业、提高素质相结合；特许经营的产业要更多地向低收入群体、困难群众倾斜，使该区域的居民群体能够享受到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建设与发展带来的积极成果，从而激发群众参与生态保护的内生动力。

总之，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在实现生态产品价值的转化过程中，生态保护是前提和基础，生态产业转型必须以生态保护为基本原则；生态产业转型是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基本途径，产业转型必须以法律法规为基本准则，以当地的区域环境承载力为依据，以自然生态环境的最优保护为目标，因地制宜，因时置产；生态富民是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最终目的，生态富民能够有效地提升当地群众的环保意识，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群众更加积极地投身于生态保护事业，珍惜身边的生态资源，推动当地生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长城国家公园